

贬官之途与传世之文

□晏建怀

“贬官文学”为我国所特有，从司马迁《史记》到屈原《离骚》，再到后来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等皆是。《古文观止》一书中所选编的“宋文”中，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和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两文，恰恰也是作者创作于贬官途中，且都成为了千古名篇。

忧亦不改其乐

欧阳修学问深、文才高，领导了北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，又主笔

《新唐书》，独撰《新五代史》，既为“一代文宗”，亦为一大史家。不过，成就斐然的他，却为人刚正，讲话耿直，这种性格无论是在他任小小馆阁校勘时，还是在他后来任皇帝的秘书知制诰时，皆表现得十分激烈，故得罪了一大帮朝臣，正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所说：“修论事切直，人视之如仇。”人家都视他如仇敌了，这人得罪人得有多深？尤其是在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改革过程中，他力挺范仲淹，而得罪了宰相吕夷简，给本来还算顺利的仕途平添许多坎坷。

《醉翁亭记》是欧阳修于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被贬为滁州知州后所作的一篇山水游记。贬官滁州，表面上是同僚以“其孤甥张氏狱，传致以罪”弹劾他，说他与妹夫前妻之女张氏通奸，有“不伦之罪”。而究其实际，却是因为他耿直的性格遭到权贵的忌恨，《黜记》亦说：“欧公庆历间为谏官，大忤权贵。未几，以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运。公在河北，职事甚振，无可中伤。”正因为“大忤权贵”而又“无可中伤”，他们便杜撰情节，凭空诬陷。不过，事虽无实，宋朝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但凡御史弹劾，被弹劾者即便无罪，也大多会被贬官，在处理原则上，有点尊重御史并息事宁人的意味，欧阳修因此被免去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，贬去滁州。

《醉翁亭记》通篇写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开怀畅饮的欢快之情，全文只400多字，却有21个“也”字，一路“也”下来，把滁州山间之景写得多姿多彩，将游历宴饮之乐写得酣畅淋漓。同时，全文以“乐”字贯穿始终，从山水之乐写到宴酣之乐，从宴酣之乐写到禽鸟之乐，又从禽鸟之乐写到人之乐，再至太守之乐。这一路“乐”下来，似乎天地、山林、禽鸟与人之间，都沉浸在一片欢乐海洋中。虽然写得绘声绘色、烟花烂漫，但是，你读着读着，便能慢慢感觉到一种乐越来越少、忧越来越多的抑郁情绪从字里行间蔓延开来。

其实并不很难理解。同僚以“不伦之罪”告他，辩之则越描越黑，不辩则等于默认，于是便以写《醉翁亭记》这种自得其乐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豁达，以豁达的姿态来证明“不伦之罪”的子虚乌有。然而表面的豁达，难以掩饰欧阳修内心深处的悲情，难以掩饰那种乐中有

苦、笑中有泪的复杂情感，让人不禁生出“烟花背后是寂寞”的感慨。

穷而尤见其达

无独有偶，苏东坡的贬官之途，让他写下了千古美文《前赤壁赋》。《前赤壁赋》写于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，因此有人说：“苏东坡成就了黄州，黄州亦成就了苏东坡。”诚哉斯言！

苏东坡与欧阳修是师生关系，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，欧阳修是主考官，苏东坡对欧阳修佩服不已，欧阳修对苏东坡也欣赏不已，他读了苏东坡的文章后，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二人既相互欣赏，亦兴味相投，更气性相通，都有一股子倔脾气，说话不求中听，但求属实，直来直去，口无遮拦，用苏东坡的话说则是：“如食内有蝇，吐之乃已。”

王安石推动“熙宁变法”期间，苏东坡先后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官，耳闻目睹个别新法的推行在民间走了样，造成一些弊端，给百姓带来了不便，因此多次向宋神宗上书言新法的不是。当时，朝中御史颇有些看皇帝的脸色说话行事，所谓“观风言事”。宋神宗以少有的帝王勇气推动变法，他是下了很大决心、克服了很多阻力的，故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毫不手软。

因苏东坡多次在上书中数说变法的不当之处，一些观风的御史便故意“找茬”，在苏东坡的诗文中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，说他诗文中有关攻击新法之语，以“讪谤朝廷”的罪名弹劾他，苏东坡于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，坐牢百余天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后在亲友及朝臣的大力营救下，才捡回这条卿卿性命。不过，苏东坡出狱后，又提笔赋一诗曰：“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休官彭泽贫无酒，隐几维摩病有妻。堪笑睢阳老从事，为余投檄向江西。”受此九死一生的打击，他仍“诗言无忌”，真是“无可救药”。

事后，苏东坡受罚而“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、黄州团练副使”。所谓团练副使虽是个官名，但不过是专门给予贬谪官员的一种寄名，因为官名后面，往往还会附带“不得

签署公事，不得擅去安置所”的尾缀，苏东坡这次贬官就有这个尾缀，这就如同羁押、形同囚犯了。苏东坡从1080年2月开始谪居黄州，到1084年4月调往常州，在黄州度过了整整4年零两个月时间。

来黄州的第三年，也就是1082年的7月和10月，苏东坡两次泛舟长江，与友人结伴观景，事后写下前、后两篇《赤壁赋》。苏东坡所游的黄冈赤壁，其实并非三国孙曹鏖战的赤壁，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在今湖北赤壁县西北的长江南岸，不过，黄冈亦有赤壁之战的传说。

《前赤壁赋》之所以成为了千古名篇，不特因为苏东坡在文中对赤壁长江美景的细腻刻画，还因为通过对明月和江水的变与不变的议论，表达出对自然、宇宙和生命的深入思索，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胸襟，其文之流畅优美，议论之精深精警，均达到了散文中少有的高度，尤其一句“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，真是洞悉人生、气格高拔的感悟，给人启迪，亦让人过目不忘。

人在得意时，总难免热心于顺境下的文朋相聚和同僚交结，热衷于功名爵禄和仕途进取，热则热闹，但于心不静。而当厄运来临，远谪蛮荒，去去千里烟波，误解与排挤齐至，构陷共驱逐叠加，当所有的烟花都已散去，给世界留下的，便只有一个孤独的背影。

然而，当前尘往事在无数个孤寂的夜里慢慢沉淀后，烦忧如抽丝剥茧一般无声飘离，郁结便开始消散。这种时候，头脑是最清醒的，内心是最澄明的，很多人际遇因此释然，对生命和宇宙便有了更深刻的领悟，于是，寄情于景、借景抒情，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，一篇千古美文就这样喷薄而出。而这样的美文经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后，自然进入了经典的行列，如夜空中



周母索要田地。周母不知就里，见龙聿挥舞着田契又气又急，一纸诉状将龙聿告到永新县衙。知县升堂审案，依据龙聿握有田契，且田契上按着周母鲜红的指印，判周母败诉，田产归龙聿所有。周母不服判决，又将龙聿告到州衙门，又因同样的缘由输了官司。

周母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，依然不断上告，誓死要讨回公道，这个案子就拖了下来。

元绛调任永新知县以后，周母再一次将龙聿告到县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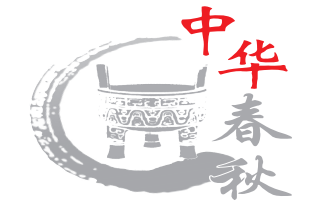
元绛双手捧着田契审视良久，忽然眉毛一扬，指着龙聿呵斥道：“大胆刁民，居然胆敢伪造田契来欺蒙本官！”

龙聿不服，声称地契绝对真实。

元绛指点着地契上的指印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券年月居印上，是必得周母他腓尾印，而撰伪券续之耳。”——这份田契上书写的年月字迹盖在指印的上面，说明你必定是先得到了周母其他按过指印的文书，然后在上面作伪书写的契约。

听罢元绛的分析，龙聿大为骇服，即将田产归还给周母。

元绛不惧权贵，勇于担当，刚正不阿，浩气贯长虹；为官一方，明镜高悬，铁面无私，理冤狱，伸正义，为民除害，政绩卓著，深得百姓的景仰爱戴。



崔庆

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好男儿，不读书，何以用？但只读书、读死书，书生就变成了“书呆子”，有人也常用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自嘲。真正的书生绝不是这样！胸怀家国，剑胆琴心，万卷书通万里路，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。东汉的虞诩就是这样一位书生，如果说班超是天赐汉家的将中魁元，那么虞诩就是从书生中脱颖而出的百胜战神。

边事大讨论

虞诩生活在东汉安帝、顺帝年间，是一颗读书的好种子。父母早逝，他苦学不倦，12岁能通《尚书》，深知孝义。他为赡养九十高龄的祖母，甚至婉拒了地方官的举荐。后来祖母仙逝，虞诩服孝期满，才应征入仕，担任太尉李修府中的郎中。初入仕途，这位书生就引发了一场举朝关注的大讨论，这源于朝廷谈论西北边事。

东汉中期，朝廷经常被西部诸羌和北部匈奴侵扰。永初四年（公元110年）春，羌兵劫掠西部，声势浩大，形势急迫。先零羌首领滇零袭击陇中（属汉中郡），汉中太守郑荣率军迎敌，却战死乱军之中。同年七月，总督诸羌事宜的护羌校尉、经验丰富的老将段禧病逝，汉朝的西部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。大将军邓骘能左右时局，他打算放弃西部的凉州，收缩战线、集中力量，经营北部的朔方，抗击北方强敌匈奴。小小郎中，原本无资格上朝谈议国事。但虞诩位卑未敢忘忧国，得知朝廷有意放弃凉州，心中万般焦急。他先痛陈利害，说服太尉李修代为上奏，力谏万万不能放弃凉州。

凉州地处关西，俗语说“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”，从地理看，凉州是汉朝重要的边塞屏障；从人口看，凉州是汉帝国的重要兵源地。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，无论有多大困难，都绝不能放弃凉州。国虽大，寸土无弃。虞诩的谏言警醒更多公卿大臣，反复讨论之后，无人再言放弃凉州了。

妙计安朝歌

大将军邓骘因为虞诩“搅局”心怀不满，寻机报复。不久，虞诩被任命为朝歌的地方长官。此时的朝歌是“死地”，叛匪四起，已有多名地方官被杀，亲朋故旧都劝说虞诩不要赴险，他反倒劝说大家不要担心。虞诩早已成竹在胸，朝歌将是牛刀小试之地。

在众人的叹息声中，虞诩火速上任，并向上级河内太守马援报到。马太守感叹说，虞诩啊虞诩，一个书生，在朝廷里谋划方略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，来这险恶之地干什么啊？虞诩慷慨对答说，既然身为入臣，何取避难。虞诩不仅有勇气，也有眼光。他马上给马援分析战况，指出叛匪虽然人数众多，但是他们没有占领军事重地粮仓和兵器库，可见只是乌合之众，毫无大志。虞诩向马援许诺，只要有宽松政策，允许灵活应敌，就有信心平定叛乱。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，马援一路绿灯，同意让虞诩放手一搏。虞诩得到了政策支持，便开始积极筹划反击。

虞诩不拘一格，招纳人才。赦免那些好勇斗狠之人、鸡鸣鼠盗之辈，择其精锐，组成了一百多人的队伍，让他们混入叛匪之中，鼓动叛匪离开根据地，外出劫掠。虞诩事先在途中设下埋伏，消灭了大批叛匪。虞诩又秘密招募善于缝纫之人，让他们受雇为叛匪缝补衣服，乘机给衣服标注记号。叛匪穿此衣服，出入城市乡村的，被官兵一一捉拿。叛匪屡屡受挫，认为神灵护佑虞诩，心里害怕，队伍也就散了，朝歌安定下来了。由此，朝廷真正认识了虞诩这位“书生”。

增灶惑羌兵

元初二年（公元115年），羌兵再次叛乱，进攻凉州武都郡，西线再次告急。国难思良将，掌控朝政的邓太后果断派遣虞诩为武都太守，并亲自接见了

他，大加勉励。五年之后，正是虞诩力排众议，建议国家绝对不要舍弃凉州，慷慨之言声犹在耳。那么现在，是时候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了。不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乎？要救武都，就得先到达武都，然而去往武都之路已经是危机四伏。

羌人早就知道虞诩的大名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在路上截杀虞诩，不让他进入武都。数千羌军集结在汉军的必经之路陈仓峭谷，准备伏击虞诩所部。虞诩探知到了羌人的部署，就不再向武都方向前进，让部队就地驻扎，佯装出战略相持的姿态。同时，四处散布消息，宣称不会救援武都，需要等待朝廷更多的援军。羌兵听说后，放松了警惕，分兵四处劫掠去了。这时，虞诩下令部队马上急行军，穿过敌人的伏击圈，一天赶路两百里，并让每位士兵沿途每日加倍造灶。“虏见吾灶日增，必谓郡兵来迎”，虞诩制造出了友军相援的声势，让羌军不敢轻易追赶。

武都三板斧

虞诩顺利进入武都郡，清点守军，发现加上自己带来的部队，可用之兵一共才三千人，而武都外圈的羌兵已经超过了万人。此地不是当年的朝歌，打大仗需要本钱，虞诩手中的牌不多，但这不妨碍他使出“三板斧”。

第一招，换弩灭敌。与羌兵的第一仗在赤亭，赤亭和武都郡治下辨成犄角之势。敌军兵临城下，虞诩让士兵先用射程比较短、杀伤力也很弱的小弩迎敌。羌兵一看，汉军的弓弩太小几科了，便放心纵兵攻城。羌兵一靠近，虞诩马上下令全军换用射程远、穿透力强的强弩杀器，集中射击羌兵的主力部队，箭雨突至，汉军大获全胜。

第二招，兵不厌诈。首仗告捷，但羌兵仍然势众，不肯轻易退去。第二天，虞诩集合所有部队，从东门出城，再从北门入城。同一批部队，改换服装，往复循环多次。羌军侦探消息，不知汉军到底有多少兵马，军心动摇，开始溃散。

第三招，攻其必溃。经过几次和羌兵短兵相接后，虞诩估计敌人将要撤退。于是，在其撤军必经的河道处设下伏兵。果不其然，羌兵乘着夜色撤退，结果正入汉军的“口袋”，大败溃散。

安邦定国乃书生大志，也是虞诩所愿。武都保卫反击战之后，局势安定，虞诩马上转入经营建设。虞诩四处勘察武都郡内地形，择其要处，构筑一百多处营垒，也就是军事据点，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同时，召回流民，鼓励农桑，发展民生经济。虞诩初到武都，郡中户口只有万户左右，而两三年后，武都人口达到了四万户。

宁为骨鲠之臣

一介书生在怀疑声中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绩，当然书生还是书生，书生永远都有硬骨头。永建元年（公元126年），虞诩担任司隶校尉，巡查京畿，监察百官。当时，东汉受制于外戚和宦官，朝政每况愈下。虞诩不改书生本色，秉中持正，不避权贵，上任几个月内就连续弹劾了太傅、太尉和好几位中常侍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挽回国家的颓势，如同当年争论西北边事一样，朝中再次震动。朝堂上好久没有这样格格不入的“奇人”了，居然引发三公联名弹劾，堪称千古奇谈。当时，顺帝知道虞诩忠义，两边都不责备，和稀泥了事。

然而，虞诩认准了理，就不会放松。没过多久，虞诩准备查办中常侍张防，张防是宦官首脑之一，深受顺帝信任，权势熏天。虞诩多次上奏都是泥牛入海，愤慨之下，采用极端方式，自投廷尉的大牢，上书顺帝，陈述张防罪状，拼死一搏。然而张防巧言辩解，获得顺帝的信任，虞诩被免官，“输作左校”，也就是服苦役，进行劳动改造。张防对虞诩欲除之而后快，派人两天之内连续拷问虞诩四次。纵然是金剛铁骨，也难受煎熬，连狱卒都看不下去，劝说虞诩自尽了事，图个痛快。然而虞诩依然不改豪气，坦言“宁伏欧刀以示远近”，绝不自杀。后来，浮阳侯孙程、祝阿侯张贤为虞诩抱不平，顺帝醒悟，终于翻案。后来，虞诩还担任过尚书仆射和尚书令。

无论在哪一任上，虞诩都是忠于职守。弹劾官吏，针砭时弊，谈论朝政，绝无私情，因此也屡屡触怒权贵，也多次遭到审查和刑罚，但始终不改书生本色。学能通经明理、有报国之心，行能兼具忠义，有报国之才，这才不愧是真正的书生。

